

王大隆致郭则沅函笺释*

马佳立 柳向春

前几年因缘际会,我曾与友人合作整理桂文灿《经学博采录》^①。在此书卷首刊载的代前言《南海桂文灿及其〈经学博采录〉》^②一文中,曾提到了吴县王大隆(欣夫)先生当年整理刊布《经学博采录》时的大致情形。但因撰文时候文献阙如,小文在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有推断之处,不尽符合事实。拙文刊出之后不久,承业师吴格先生见示欣夫先生致闽侯郭则沅(蜚云)先生手札复印件一份,虽然只有短短的两纸,但中间不仅揭明了欣夫先生删削《经学博采录》的原委,还可以从中窥见当日学人往还周旋,以风雅相尚的情形。因此不揣鄙陋,谨将此函略加疏解,一则以自讼,一则以见前辈的风流雅致。

蜚云先生有道:

去年《辛巳丛编》印成,托修绠堂代为分发,尊处想早取到。晤君九先生,知《经学博采录》一种,古学院已据别本付梓。对校《丛编》本,溢出一卷,自是足本可贵。惟敝处所据为皓亭先生哲嗣南屏先生所藏手稿,弟整理时见复出一卷,故径行删去,想即缺一卷而误重出者。香港之变,桂氏手稿均烬,幸弟先抄得数种,以《群经补证》为最精。《丛编》既告停顿,不知尊处仍可陆续付刻否?如须佳稿,此种可备采也。弟前读《管子》,踵高邮、德清之续,成《校释》八卷,曾取《形势篇》“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”语,颜所居曰“抱蜀庐”,亦犹苦县“抱一为天下式”之谊也。素治校雠之学,服膺惠定宇、钱竹汀、王石臞、顾涧蓂四先生,既成《松崖读书记》、《思适斋遗书》,本师曹叔彦先生已序之矣。近倩友人为作《抱蜀庐校书图》以志微尚,谨具素笺,求赐题咏,以光卷帙,(敢)不胜大幸。《东塾杂俎》闻已刻成,拟备价商订一部。迩来纸张奇贵,不敢轻言索取也。公诸兄想常见,弟亦思求题《校书图》,欲通函而恐旧址或迁移,晤时乞先代致意为幸。专此。即颂著祺,并候惠复。年小弟王大隆顿首。二月廿九日

* 此文原文曾经同门复旦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陆骏博士润色,特此致谢。

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年。

②此文初刊于台湾《“国家”图书馆馆刊》2010年第2期。

该函作者是吴县人王大隆,字欣夫,号补安,以字行。曾先后任职圣约翰大学及复旦大学,是闻名遐迩的一代文献大家。他一生著述弘富,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《文献学讲义》。蛰云则是候官郭则沄,字啸麓。光绪癸卯进士,曾为简任浙江温处兵备道,后来又曾署理浙江提学使。生平撰作有数十种之多,已经刊行问世的有《十朝诗乘》等。

信中提到的《辛巳丛编》,是王欣夫与昆山赵诒琛(学南)先生合力纂辑的“八年丛编”中最末的一辑。信中说及“去年印成”等等,则此函应该是作于《辛巳丛编》成书的次年。不过我们如果仔细考察信中所说的各项事宜,则可以断定,这封信实际上是作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九日。也就是说,《辛巳丛编》完全印成,已经是民国三十二年壬午之际了。

修绠堂是当时北京的一家书肆,据《琉璃厂书肆三记》记载^①:“修绠堂。孙锡龄,字寿芝,冀县人,于民国六年开设。至二十三年寿芝长子诚温、仲子诚俭继其业。二十七年弟兄分手。”《辛巳丛编》之所以由修绠堂分发的缘故,是因为肆主孙助廉也是这一丛编的赞助人之一,曾经出资四股^②,以襄助印刷。

君九先生是指欣夫先生的同乡前辈王季烈。君九先生成为进士,比蛰云晚了一科,行辈稍微靠后。但这二人的交谊极为深厚,如蛰云所著的《红楼真梦传奇》八折,谱曲的人就是君九^③。而据王先生此信,欣夫先生知晓古学院重刊南海桂文灿《经学博采录》一事,也是从王君九这里听说的。今考郭蛰云将此书刊入《敬跻堂丛书》是在民国三十二年冬,也就是说,在欣夫写这封信的时候,《经学博采录》一书应该还在印刷之中,或者只是刚刚面世而已,但即便如此,君九就已经知道了这一事情的状况了。透过这一桩事情,也可以看出君九与蛰云两人来往密切的情形来。

郭氏刊印的《经学博采录》,是根据钞本付印的,他在民国三十二年冬的刊书序言中说到:“道咸间士崇实学,始复有通汉、宋之邮者,番禺陈兰浦先生其著也。南海桂氏子白,为先生入室弟子,实踵承令绪,津导学海,著书满家。然北方学子获睹其书者殊罕,余窃憾焉。比与先生孙蓼公共事古学院,承出其先著《东塾杂俎》手稿,既斟订付梓,适吾友黄君君纬藏有桂氏遗著多种,皆未刊之稿,《经学博采录》在焉……借钞竟,亟举付剞劂,以饷后学。”而在这个时候,《辛巳丛编》本《经学博采录》实际上已经面世了,但蛰云认为:“会吴县王君欣夫主辑《辛巳丛编》,采及是书,先印成见寄。窃幸衰晚寂寥,乃有铜山洛钟之应。及取以互勘,则兹编条举增于《丛编》本者凡二十有一^④,其卷二自首至末皆彼本所无。余虽并见,而兹之所载,时复增详,疑此为最后写定者。其间讹

①孙殿起《琉璃厂小志》第三章《书肆变迁记》中所载,北京出版社,1962年,第121页。

②参《辛巳丛编》卷末所附捐助人姓名录。

③民国三十一年石印本。

④经逐条核查,这个本子较《辛巳丛编》本多出十八条。

脱互异则就两本衡较,择其善者从之,而复授手民刊正焉。自揣荒陋,又率臆去取,无所就正,深恐有专断之失。”这里所说的君纬,应该就是贵筑人黄襄成,一作细丞,号细庵,是晚清名宦黄彭年的孙子、黄国瑄的儿子。在抗战后,曾任中央银行天津分行副理。民国二十九年,曾经加入北京延秋词社,与蛰云为同人。他的名字又见于蛰云的《蛰园律集》前后编,这些事实都可以反映二人交游来往的一些状况。而黄氏向来又以藏书著名,故所藏中有桂文灿这书的抄本,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与此相应,欣夫先生在民国三十年季秋所撰的《经学博采录》跋文中则说到:“今哲嗣南屏先生站自香港寄示此稿,凡十二卷。原本纸敝墨渝,传钞又多脱讹,谨校除复重,条次先后,复位为六卷。”序中所说的所谓“校除复重”,指的应该就是这封信中所说的:“惟敝处所据为皓亭先生哲嗣南屏先生所藏手稿。弟整理时见复出一卷,故径行删去,想即缺一卷而误重出者。”两处文字对勘,就可以知晓当日欣夫先生刊行的《辛巳丛编》本《经学博采录》中,为什么会比桂文灿的原本缺少了第二卷这一事实。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拙文中,我曾强作解人,以为欣夫先生之所以要删节第二卷,是因为它的内容斑驳不纯,不符合桂氏著述的一贯宗旨。现在有了这封信作为证据,可见前说的毫无根据,完全属于臆断。前文又曾怀疑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网站中著录的所藏《经学博采录》稿本为十一卷应该是错误的。但现在对比东莞伦哲如先生所说^①:“且第十二卷多与前卷复出。岂是初成之藁,尚有待于整理者耶?”与这里所录的王函所说,完全符合。也就是说,中科院藏本与桂氏家藏的本子完全相合,都缺少第二卷一卷。而中科院网站之所以说是只有十一卷的缘故,应该是去除了这个本子的复重之后而然的。

欣夫先生之所以能够获得《经学博采录》的稿本,完全是依靠桂文灿之子南屏的帮助。南屏就是桂氏的次子桂站,他是光绪二十年甲午进士,后为翰林院检讨,补用道署浙江严州府,清国史馆总纂。曾任职广州广雅书局。晚年的时候定居香港。欣夫先生在结识南屏之后,曾经得到他的很多帮助,如《辛巳丛编》的封面题签,就是出于南屏的手笔。而桂文灿的遗著,也都是因为南屏将钞本寄给了欣夫先生,才得以广为流布的,例如这封信中所说到的《群经补证》一书,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《群经补证》也是桂文灿精心结撰的一种著作,同治改元后,桂文灿曾将他所著的《经学丛书》六十四卷进献给内廷,得旨留览宫中,并有谕旨说^②:“所呈各种,考证笺注均尚详明。《群经补证》一编,于近儒惠栋、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诸经说多所纠正,荟萃众家,确有依据。具见潜心研究之功。”但这个书在

①见其所撰该书提要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(稿本)》第15册,齐鲁书社,1996年,第25页。

②同治元年(1862)十二月十七日甲午上谕,《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卷五十三,伪满洲国国务院发行,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影印,1934-1936年,第43-44页。

进呈的时候,应该还是初稿,后来还陆续有所补订。据桂氏的儿子们所撰的《先考皓庭府君事略》中说^①,《群经补证》为六卷^②。《中国丛书综录》中著录了此书,说是已刊,也说是六卷。但王欣夫先生却说此书是十八卷,又说:“余昔年属友传钞,后识其嗣南屏先生站,云家藏稿本惟此已阙,欲借钞。因余拟辑入纪年《丛编》而止。《丛编》系集资所印,选材不得不瞻徇众好,此书卷帙较巨,又属朴学,遂因循未果。”^③也就是说,这部书稿无论是否曾经刊行,反正是非常罕见的。复旦大学图书馆中,藏有王氏学礼斋钞本《孝经集证》十卷,前面有王欣夫的手跋,说:

皓庭遗著有数种,虽付刊而传本殊渺。其进呈各种写本今在故宫博物院,曾从传钞,《孝经》有两种,此及《集解》也。及识哲嗣南屏先生,又钞得文集,惜舛误甚多,尚待校理。先择《经学博采录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两种^④引入纪年《丛编》,他未逮及。其《群经补证》最佳,马君夷初向余借读,叹为必刊者,尚藏篋中,不知何日遇好事者为之传布耳。三十八年九月,欣夫。

《越缦堂读书记》(同治壬戌六月二十六日)中,也记载了李慈铭的看法:“借得桂孝廉文灿《诗笺礼注异义考》,意在申明郑学,而寥寥数纸,词旨拙涩,远不及其《群经补证》。”^⑤也认为《群经补证》是桂氏著作中的佳作。而东莞伦哲如先生撰写的“群经补证十八卷”提要中说,此书“凡《易》十条,《书》十三条,《诗》二十八条,《周礼》十三条^⑥,《仪礼》二条,《小戴记》二十四条,《春秋左传》一百四十条,《公羊传》一条,《论语》八条,《孟子》五条,《孝经》二条^⑦,《尔雅》六条,《说文》十六条^⑧。诸条引证不博,似是读经随意札记之作,而陈义多当。”又说:“此本亦经进呈,故篇首列衔称臣,与《孝经集证》同。”^⑨但王欣夫先生则认为子白此书“每立一说,皆博综群书,通以音韵训诂。于《诗》、《礼》不泥郑,于《左氏传》必规杜,盖其学实事而求是,博涉而多通,其

①桂坛等《先考皓庭府君事略》,《禹贡川泽考》附,利华印务局,民国三十五年(1946)重印本。

②按:《辛巳丛编》本《经学博采录》卷六亦云:“既编《经义记》为《群经补证》六卷……”则十八卷本者,或为子白晚年重编欤?

③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“甲辰稿”卷一“群经补证十八卷”条,第1154-1155页。

④“两种”当作“三种”。《论语》即《论语皇疏考证》十卷,收入民国二十九年所编之《庚辰丛编》,《孟子》即《孟子赵注考证》一卷,收入民国二十五年所编之《丙子丛编》。

⑤由云龙辑,上海书店,2000年,第42页。

⑥按:王欣夫云《周礼》十四条。见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“甲辰稿”卷一“群经补证十八卷”条,鲍正鹄、徐鹏标点整理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154-1155页。

⑦按:王欣夫云《孝经》三条,同上注。

⑧按:王欣夫云《说文解字》十三条,另有《广雅》三条,同上注。

⑨见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(稿本)》第15册,第115页。

于兰甫先生犹郑门之有临孝存”。^①可惜的是,如今王氏学礼斋旧藏的这部《群经补证》已经公开拍卖,不知散落到什么地方了。不过,我们根据前面所引的欣夫民国三十八年九月的文章可知,这封信中所表达的希望蛰云能够将《群经补证》也一并付梓的愿望,终究是没能实现^②。

据欣夫先生自己所说,他研习《管子》一书的方法是:“余校《管子》,读戴氏书,病其贻误后学,有校而不正之叹。因据各本覆校,令复原来面目,先将陈硕甫校蔡本、赵用贤刻初印本详校此本(清光绪中覆宋刻本)。”^③另外根据业师吴格先生《吴县王大隆先生传略》中介绍^④,欣夫先生尝撰有《管子校释》一书。但该传中并未说明这书的部头究竟是怎么样的,或许记录这条的时候,只是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,而并没有见到原书,如果这是这样的话,那这书到底是否还存在,也是个未知数了。

《松崖读书记》一书,是欣夫先生历经多年才搜辑而成的,全书计二十二卷,又附有《更定四声稿》四卷、《增辑松崖文钞》二卷,共十四册。但现在能看到的本子,只有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二册,其全书是不是依旧存世,现在还不忍断言。

《思适斋遗书》这个名字,应该是统称,据李庆撰写的《顾千里集》的出版说明:“王欣夫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就注意收集顾千里的题跋和佚文,曾编刊过《思适斋题跋》四卷、《思适斋集补遗》二卷,又都刻入他所编的《黄顾遗书》。后又进一步收罗资料,统编成《增订思适斋集》共二十卷。”^⑤《顾千里集》卷末附录中有余嘉锡所撰的《黄顾遗书序》,其中说到:“(欣夫)又辑黄尧圃、顾千里两家经籍题跋及集外文都六种,颜曰《黄顾遗书》。刻既成,索余为之序。”^⑥而《黄顾遗书》则有民国二十二年秀水王氏学礼斋刊本,一函六册,收有黄尧圃、顾千里的著作五种十四卷。这里所说的《思适斋遗书》,应该就是指《黄顾遗书》中有关顾氏的部分。这封信中又说“既成《松崖读书记》、《思适斋遗书》,本师曹叔彦先生已序之矣。”曹叔彦就是吴县曹元弼,字谷孙,又字师郑,一字懿斋,晚号复礼老人,又号新罗仙吏。欣夫曾跟随他问学多年。而叔彦曾经为《松崖读书记》作序是肯定无疑的,但也曾为顾书作序的这个说法,则恐怕不大确实,因为如今的《顾千里集》、《复礼堂文集》中,都根本没有这篇序言的踪迹。因此,信中的这个说法,大概只不过是连笔而书,不能当真的。

关于《抱蜀庐校书图》,王先生在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致如皋冒广生

①见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“甲辰稿”卷一“群经补证十八卷”条,第1154-1155页。

②此或与蛰云于民国三十五年弃世有关。

③见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“甲辰稿”卷三“管子二十四卷”条,第1288-1289页。

④见于(台湾)《书目季刊》三十五卷第一期,2001年,第43-49页。

⑤《顾千里集》卷前,《中国历史文集丛刊》本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2页。

⑥《顾千里集》,第429页。

(鹤亭)先生的信中也曾提到过:

前年读《管子》,曾取《形势篇》“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”语,颜所居曰“抱蜀庐”。定字诂“蜀”为一,即苦县“抱一为天下式”之谊。退庵先生为书额,而公雄兄为作校书图,拟求海内硕彦锡以题词。而左右夙从捧手受教,渊源所渐亦最深,不可无一言以增光宠。谨具素笺,拜恳藻饰,谅蒙垂许,不胜幸甚。^①

据王欣夫先生钞本《抱蜀庐校书图题词》记载,这个图是吴县顾则扬(公雄)“癸未冬日似欣夫仁兄世姻先生雅正”者^②,题词者除了郭则沄之外,还有曹元弼以下二十二人,而其中并没有黄孝纾的名字。蛰云曾为这幅图题了《金缕曲》一阕:

梦绕巴山雨,叹浮生,频年梗泛,似牵船住。手定松崖丛残卷,字字蛟龙潜护。更着意、模王挹顾。指点松鳞如人老。感岭嶂,晚赋兰成树。身世恨,此中付。蜀天无那啼鹃苦,睨神州,山残水剩,霸才谁主?收拾盈腔伤时泪,寄与丹铅朝暮。算本穴、犹余完土。莫问中原何日定,黯江关,怕听闲笳鼓。嚟喟夜,起还舞。欣夫仁兄同年大人属题《抱蜀庐校书图》,久未报命,深用惭疚。倚声奉寄,即希正拍。蛰云弟郭则沄。

欣夫先生的《校书图》除此之外,还有一幅,即《抱蜀庐校书第二图》,是临桂况周颐的长子况维琦写图,民国三十五年三月马叙伦题额的,题词的人则有夏承焘、任铭善、徐震堃、胡士莹、陆维钊、凌景埏等六人。

至于信中所说的《东塾杂俎》一书,欣夫先生则始终没有见过,这一点,可以参阅他的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中所说:“至《东塾杂俎》,十六年前亡友郭啸麓则沄为古学院付雕,迻书索之。而适啸麓病逝,未能与此(《东塾读书记》)为侣也。”^③根据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十六年前的说法,我们也可以考知这封信的写作年份,即民国三十三年。

作者工作单位:马佳立 榆林学院图书馆

柳向春 上海博物馆

①参拙文《王大隆致冒广生函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0年8月19日第15版“学人手札”专栏。

②观此图所作年月,可知此函必作于甲申。

③“庚辛稿”卷三“东塾读书记十三卷又三卷”条,第184-185页。